

张謇墨话

□姜连生



传家宝

偶得张謇自用墨一锭，长11.5厘米、宽2.3厘米、厚1.2厘米，正面刻有“季直之墨”四个阴识刷金隶体字，下面有一方“张氏季子”朱红阳文章。墨背面刻有“磨磷于世俗以取戾，而不可为也。《明夷》象曰：君子用晦。”34个无标点隶体字；墨右侧刻有“光绪九年七月胡氏制”九个楷体字。查阅《张謇日记》，光绪九年六

月二十三日记：“作墨铭二，磨磷于世俗以取戾，而不可为也；放辟于文字以取戾，而不可为也。《明夷》象曰：‘君子用晦’。著石而墨，揉朱而挠，取镜于此，以砺玄交。”据有人考证，墨铭前为自用墨，后为合作墨。墨正背隶书均出自张謇手迹，推测此墨边款小楷字也为张謇所书。“胡氏”即为胡开文后代也，因胡开文早于1808年已卒，其众多子孙仍一直沿用胡开文墨庄之法制墨。

现在可以知道的，张謇传世的自用墨已有四种：如周绍良先生《蓄墨小言》中介绍的一种；知竹斋《人生忽然而已，

明清遗墨余香》一文中介绍的一种；上海王毅《追墨记》中介绍的一种；还有就是本人手上的一种。这四种墨的款式、大小及正反面墨文都一样，不同在侧面注记和个别的墨面用雪花金装饰上。

笔者推测，在张謇造自用墨之初可能只有一二种款式，也是很普通的，留作自用或送朋友。其他款式是在他中了状元以后再造的。因为张謇制墨是搭在吴长庆庆祝朝鲜战争胜利班师回国纪念一起造的。有关资料介绍，吴墨是最为普通的长方形墨，既实用，又可作礼品。因此，张謇当时跟着同造自用墨，一是地位

低下，二是经济一般，不会超越吴墨。只有张謇中了状元后，身价地位不一样了，随着声名鹊起，自用墨作为一种高雅礼品用于交际，在质量与款式上作适当调整以满足需要，也在情理之中。再则，作为胡氏众多制墨家来说，张謇中状元后，他们翻出原有墨模，进行再造也顺理成章。所以，社会上出现多种张謇自用墨，应属正常现象。从墨书上发现，明清一些制墨名家，同一款式，同一名称，前后仿制司空见惯。只要墨质精良，墨品规整，有历史气息，无论前造后造，对研究张謇有一定的价值，就够了。

“港港经”还是“讲讲经”

□彭伟

习俗杂谈

近来，我两次看到“港港经”。一次是2019年中白蒲口述史的材料中，一次是2020年初网上的《搞笑如皋话》：“有疫情，不要串门，少港港经。”“港港经”意思十分清晰：讲讲话，聊聊天。不过说起这个如皋方言，我的第一感觉是“讲讲经”，并非“港港经”。那么，两者谁对呢？查阅《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商务版），“港”读音为gang，与如皋方言读音十分接近。意思如下：1.港湾，2.江河支流，3.香港。又查《如皋方言词典》，解

释也与《现代汉语词典》前两项几乎一样。港字不存在讲话聊天的意思。从构字看，港明显为形声字，音取巷，义取三点水，与河水有关。想起电影版《鹿鼎记》中的经典台词：我对你的景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犹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像韦小宝那样能说会道的，讲起话来口若悬河的人，是不是可以用“港港经”来形容呢？这肯定不行。因为此词在如皋话中，表示随意的聊天谈心，但不能显示出讲话人的语言能力。因此，“港港经”只是民间人士根依据发音自造自写的如皋方言，虽悄然流行，但不宜提倡。

“讲讲经”才是地道如皋话的正确写法。《如皋方言词典》中录有“讲讲”一

词。“讲”读音即为“港”，其词义为：聊天、谈论、争论、评论别人等。同录词语还有“讲头”“讲闲话”“讲老洋”等，均是如皋人耳熟能详的方言，都与“讲”字有关。只是“讲”在如皋话中为何会读“gang”呢？可从《康熙字典》说起。查阅1980年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康熙字典·西集上》，讲：《唐韵》《集韵》《韵会》《正韵》，从古项切，音港。四部韵书中，《唐韵》成书最早，著者为唐初音韵学家孙愐。《正韵》成书最晚，全称《洪武正韵》，顾名思义，成书于明初洪武年间。据此，自唐至明，“讲”在古人口中均读“港”音。讲的古音又如何能在如皋、东台等苏中地区普及开来呢？《东台方言词典》中有线索可寻：

“讲”读音如同“”，与“港”读音类似，源自吴语读音。又查《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吴方言中，讲白淡：闲谈，“讲”音也类似“港”。吴方言中相关词语还有“讲斤头”“讲空话”“讲闲话”等。其中“讲讲张”“讲张”，无论是读音，还是意思，与如皋方言“讲讲经”“讲经”是一样的。笔者喜存如皋家谱，所见诸多家谱中，如皋诸姓族人大都都从苏州迁居而来，所以如皋话中保留吴语读音，不足为怪。

综上所述，论读音，论意义，论起源，“讲讲经”才是正宗的如皋话，表示聊天谈心。日后，希望少见“港港经”，以免以讹传讹，使后人遗忘真正的“讲讲经”。

灶台上的“搂饭筷”

□杨汉祥

江海风物

最近一日，天气晴好，我与几位有着业余收藏爱好的朋友相约下乡“捡漏”。在通东乡间一处民房拆迁地块上，有着许多刚拆完的房屋废墟，我们便走过去想碰碰运气。

临近中午，大伙儿正在那儿起劲地翻着捡着，同去的小刘突然喊了起来：“你们快来看啊，我在这座砖灶台上捡到了一双大筷子。”我们几个人上前一看，小刘手中拿的是两根一尺多长的细竹竿，竹竿的顶端打有两个细小的洞眼，一根细麻绳穿过洞眼把两根竹竿相连着，

看上去真像一副大竹筷。至于这竹竿表皮上泛着黄里带白的颜色，下半段像被开水烫熟过一样，呈现出的棕黑色，看来这个物件是有一些年头了。

此时我们几个人端详着这副大竹筷，不知其为何物，“既然是竹筷为啥要做得这么长，而且也比普通竹筷粗”“人摸起这副竹筷，即使摸到了食物又怎么能送到自己嘴里呢”……大伙儿正在疑虑不解时，在远处翻捡的老沈赶了过来。老沈是我们这伙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不但见识广，而且是当地人通人。他凑近只看了一眼就知道这是啥物件了。他说：“这东西是属于筷子类的，但不是人们用来吃饭的那种筷子，而是在煮饭煮粥时才用得着的物件，我

们讲启海方言的人称这东西叫‘搂饭筷’。”接着老沈给大伙儿讲起这“搂饭筷”的来历与作用。

其实“搂”字在启海方言中也是“搅拌”或者“搅和”的意思，“搂饭筷”指的是用来“搅拌”或“搅和”饭食的筷子。原来，当地一带紧靠南黄海之滨，过去因土地盐碱成分重，长不出水稻，所产的粮食只是玉米与麦子。人们要吃玉米或麦子就要用石磨先磨成细粉，当地人称玉米屑或麦屑。烧煮时先将锅里水烧开，然后由烧煮人一只手端着一瓢玉米屑或麦屑均匀地往锅内的开水里扬洒，另一只手抓着“搂饭筷”在锅里快速搅拌，这样玉米屑或麦屑在锅中才会均匀，锅里的饭或粥才能均匀地煮熟，并且还能成形成状。所

以，这“搂饭筷”与锅碗瓢盆一样，都是通东居民家砖灶上的必备之物。

后来，由于通东一带农村土地中盐碱成分不断减少，水稻在当地也能逐渐生长了。加上居民家庭经济条件不断好转，大米成为居民的日常主食，烧饭煮粥时再也不需在锅内使劲搅拌了。尤其后来电饭锅的普及，在灶上使用“搂饭筷”的机会更少了。现在为了变变胃口或者为了养身需要，有些人家有时也要在饭或粥里加一点儿玉米屑或麦屑之类的粗粮，但在烧煮时只用普通的吃饭筷子或汤匙稍稍搅和几下就行，完全不必再劳驾“搂饭筷”帮忙了。所以如今“搂饭筷”在社会上成了稀罕之物，至于有人将其当作收藏之物也不无道理。

记余西区扑灭瘟疫的斗争

□王士明

史海回眸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举行了国共谈判，在重庆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双十协定”）。为了执行这一协定，新四军从江南八个解放区撤到了江北。杨明同志（上世纪80年代初任上海市体委主任，作家）随军从江南到了江北。约在1945年底至1946年初，党组织把杨明同志调到南通县余西区，担任余西区委书记。当时的余西区范围较大：东到二甲（现属海门市），西至金余，北抵二支，南达海界河。余西区委则驻在二甲镇北的五福桥附近，镇上没有改军。余西区委的组织情况：副书记陈德

琪、区长姜杰、副区长陈文质、区长陈立平、指导员曹永安。区委委员有：周吉士、陈伯泉、庞宁、周兰芳（负责工会工作）、周兰芬（负责农会工作）、卞汉标，后增加了曹国宾、徐志明。隔了几个月，姜杰调走，曹永安任区长，徐志明、陈文质任副区长，陆萍任区队指导员。

与余西区委在一起坚持斗争的有：财粮股长蔡志成、会计蔡树基、负责税收的施志坚、负责金融的顾盼等。

1946年，为了贯彻中共中央“五四”土改的指示精神，余西区开展了土改工作。以后，在坚持原地斗争中，余西区工作比较出色，受到了华中九地委和南通县委的表扬。

1946年夏天，余西区霍乱流行，死了不少人。据当地人说，一条南北夹东

路（算为一甲）共长九里十三步，每条夹车路两旁总要死去几十个人。当时瘟疫传染极快，常见到一个人今天去帮别人料理丧事，明天就自己死去。全家死亡者也不在少数。有几个干部也死在这场灾难里。如忠义乡乡长，他的岳父死了，区委劝阻他不要去奔丧，他不听，就要求他不要办斋饭，不要接触死者，不要因为悲痛而忘记采取防疫措施。结果他没有按照区委的要求行事，回来后第二天就死了。

当时敌人的封锁很严密，群众缺医少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一情况，余西区委决定由杨明和曹永安（上世纪80年代任苏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立即组织一支工作队，前去扑灭瘟疫，同行的有周吉信、唐锡鸾、曹瑞芬等，共20多人。工作队深入到瘟疫流行最严重的地

区，一面做好预防工作，教育群众不到疫区去，不与病人接触，不吃生东西，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和防止疫病的流行；一面直接帮助群众治病。工作队成员都学会了打针，没有药就用土办法，用民间秘方治，用冷盐开水灌，以防止脱水。就这样，救活了不少群众。由于工作队的同志都学了一些卫生知识，加上管理严格，加强了防护，一个也没有传染上疾病。经过20多天的努力，终于将这场瘟疫扑灭了，群众更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的革命先辈在那样艰苦而缺医少药的年代里，尚且能全力以赴扑灭瘟疫。相信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也一定能打赢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织布机

□孙同林

织布机，又名织机、棉纺机等，本文所指织布机都是人力织布机。

据考古发现，我国纺织生产习俗，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见萌芽，距今2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已学会利用骨针来缝制苇、皮衣服。这种原始的缝纫术虽不是严格的纺织，但却可以说是原始纺织的发轫。而真正纺织技术和习俗的诞生流行当在新石器文化时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近7000年，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发现刻划蚕纹四条，并发现苘麻的双股线痕迹，同时出土了木质纺车和纺机零部件。2019年申遗成功的良渚古城遗产，距今5000年以上。其中，上世纪50年代在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属于良渚文化的纺织品遗存，包括丝线、麻布，更令人称奇的是一块被鉴定为最早的“绢织物”的纺织品，材质是经过缂制的家蚕丝，其经纬密度达到每平方寸120根。这说明良渚文明已经掌握了相当发达的养蚕和纺织技术。古籍传说养蚕纺织的始祖是黄帝正妃嫘祖，从这一考古来看，丝织技术的发源地很可能应是东南中国的良渚文化。

《淮南子·傲真训》中有“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臣雷公、役夸父、姜必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的记载，这可能是对纺织最早的文字记载，该著述出自西汉，距今已有2200多年。《月令广义·七月令》引南朝梁殷芸《小说》：“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纤。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后来，人们常用此典以咏夫妻睽隔，或借以表达男女相思、相爱之情。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诗》留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的著名诗句。

手工织布的织造工艺比较复杂，从采棉纺线到上机织布经轧花、弹花、纺线、打线、浆染、沌线、落线、经线、刷线、作综、闯杼、捣综、吊机子、栓布、织布等，据传有大小72道工序，全部采用纯手工工艺。每道工序、每件产品都包含着繁复的劳动，令人叹为观止。在纺织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手织布工艺还能流传下来，堪称奇迹。

人力织布辛苦繁重，唐代诗人元稹的《织妇词》中有“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旧时乡下，并不是家家拥有织布机，所以，织布成为一种职业。要织布了，将平时纺成积存下来的纱穗子，送到织布匠家里，定好布的尺寸，那就是织布匠的事了。织布匠的时光就消耗在那一丝丝一线线的布匹里。布面细密，没有跳纱，这是对老土织布的起码要求。

织布机属于框架式结构，可分为机身、机楼、机头、羊角轴、踏综板、坐机板等部件，还有综、筘、梭子等附件，多选用本地坚硬の木料制作而成。

梭子是织布时牵引纬线的工具。两头尖，中间厚，呈枣核形，装置纬线，织布人脚下每踩动一次，梭子在经线间穿行一次。

织布时，织布人坐在坐机板上，两脚分别踏动连接综上的踏板，两片综便上下交错带起，使经线张开四五厘米的张口，两手推起机头将梭子从张口中穿过带进纬线，顺势拉下，机头中的筘将纬线砸实，这样手脚配合，来往穿梭就织成布了。

当年，老家村子里有一老织布人，人称徐二织布匠。我小的时候，曾专门到他家去看织布。织布老人（是不是他本人我不记得）坐在织布机前，织布机上密密麻麻地布着一根根经线（多为两尺宽），上满棉纱的梭子在经线间来来回回穿过，每穿一次，织机的“织刀”（筘）压紧一次，接着是咣当一声，再穿一次，再咣当一声，那一匹匹布就是在这一声声咣当中完成。当然，这每一道压紧纬线的咣当声，靠的都是织布人脚下使力发出的。可以想见，织布人的艰辛，既要用心，又要用力。但对我们旁观者，尤其是不少更事的儿童而言，却觉得十分的好玩，仿佛是在做一场游戏，故南北朝时的鲍照曾在《拟行路难·其六》中写下“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织布过程中，如果按照一定比例和间距装上染色的经线，织出的就是条子布，再将染色的纬线按经线的比例和间距织入，就成格子布了。

布匹织完了，老人把布从织布机上取下，叠收起来。这便是正宗纯棉的手工“土织布”了。

织布匠的家是永远不得消停的，包括邻居，也正常处在咣咣的噪声里。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手工操作的织布工具已被现代化的织布机所代替，乡间再也听不到那种咣当的机杼声了，当然也穿不上土织布。但是，我们不能忘了人类祖先的聪明才智和勤劳朴实的精神，在那遥远的岁月里，用灵巧的双手织出他们的梦想，织出美好的世界。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